

拉什迪《金屋》中的伦理身份困境与共同体想象

Ethical Identity Predicament and Community Imagination in Salman Rushdie's *The Golden House*

邓颖玲 (Deng Yingling) 任佳佳 (Ren Jiajia)

内容摘要: 作为当代英国流散文学的代表人物,拉什迪在小说创作中一直聚焦移民和族裔流散群体在新世界的伦理身份建构。他的近作《金屋》以戈尔登一家移居美国纽约大都市后,个体在多元文化夹缝中的伦理身份错置与协商困境为主线,揭示了流散者对家园的渴望和少数族裔群体共同的文化身份诉求。同时,拉什迪通过逆写帝国的叙事解域,以及重构理性社会秩序的伦理意识,描绘了一幅多元、流动和对话的伦理身份图景,对全球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伦理共同体进行了想象和追寻。

关键词: 萨尔曼·拉什迪;《金屋》;伦理身份;伦理共同体

作者简介: 邓颖玲,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导,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叙事学研究。任佳佳,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本文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空间建构与身份认同:战后英国流散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4YBA27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Ethical Identity Predicament and Community Imagination in Salman Rushdie's *The Golden House*

Abstract: As a leading figure of contemporary British diaspora writing, Rushdie engages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plex ethical identities of the immigrants and the diaspora communities in the new world. His novel *The Golden House* exposes the predicament of the displacement and negotiation of individual ethical identity, with the clue of the Goldens' family who has encountered the challenges of ethical choice after moving to American metropolis New York, from which Rushdie tries to reveal the diaspora communities' perception of home and quest of cultural identity. Meanwhile, Rushdie outlines a pluralistic, fluid and dialogic view of ethical identity politics through the de-territorialization of the western imperial center of power and authority as well a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ational social order, aiming to ponder and put out the vision of ethical community in the

multicultural and global discourse.

Key words: Salman Rushdie; *The Golden House*;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community

Authors: **Deng Yingling**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Her major research area i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narratology (Email: dengyingl@163.com); **Ren Jiajia**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at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nd a Lecturer at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550, China). His research area is British Literature (Email: rjbest@163.com).

印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 (Salman Rushdie, 1947—) 是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 迄今已发表 14 部长篇小说和一系列非虚构文学作品, 获得了英国最佳布克文学奖等荣誉。作为当代英国流散文学的代表人物, 他对当今西方社会的文化冲突和移民伦理身份等社会问题进行了审视, 书写了一部部现实与虚构融合、传统与反传统互补、幽默与反讽并存的当代文化寓言。他 2017 年出版的《金屋》(*The Golden House*) 对美国当代政治和文化的变迁史进行了全景描绘, 讲述了戈尔登一家从印度移民到美国后, 因时空位移带来的伦理身份困境和非家幻觉如影相随, 他们开始对伦理身份归属进行重新审视和建构。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者兼旁观者、参与者为主要视角, 涉猎了当今社会的种族、暴恐、性别和家庭伦理等热点问题, 被誉为重回英国现实主义传统的一大力作 (Batra 501)。英国《卫报》评价道: “《金屋》的结构安排别具匠心, 不仅是对菲茨杰拉德等作家艺术成就的一种致敬, 更是以寓意的方式揭示了当下美国的社会与精神动荡, 堪称是一部关于身份、真相、恐惧和谎言的终极读物, 是人们寻找真相的另一种方式”。¹

一、多元文化夹缝中的伦理身份困境

在当今时代, 对伦理身份的认知比以往更为重要, 人们的伦理身份认同常常受到既定的社会环境和道德规范影响。正视伦理身份的这种复杂性, 解开导致伦理身份迷失的斯芬克斯之谜, “恢复文学的社会伦理使命”, 是现代主义作家的伦理责任 (McLaughlin 55), 拉什迪就是这种社会伦理使命的真实践行者。他在《金屋》中刻画了一系列处于边缘地位的“虚幻”、“物化”和“分裂”的个体形象, 揭示了后传统秩序造成的个体先天身份的错置和后天伦理身份的困境, 具体表现为碎片化、混杂的身份、个人与社会、家

1 Sian Cain, “New Salman Rushdie Novel Depicts Obama and Trump’s US,” *The Guardian*, 7 February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7/feb/07/new-salman-rushdie-novel-depicts-obama-trump-us-golden-house>>

庭和社会的矛盾冲突等。这种因时空位移造成的伦理身份错乱导致个体成为边缘化的他者，承受着身份焦虑以及非家幻觉带来的精神创伤。

在小说中戈尔登一家遭遇了两种伦理身份困境——家庭伦理身份困境和社会伦理身份困境。在印度经商期间，戈尔登通过非法手段积累了大量财富。在泰姬陵酒店的一次恐怖袭击中，他的妻子遇害身亡，之后便举家移民美国。¹居住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一处别墅内，戈尔登开始向外界隐匿自己的真实身份，也不准自己的三个儿子提及他们的名字、身份等任何来自母国的信息。对戈尔登而言，名字是融入美国社会的第一个印记，也是重塑为一个新美国人身份的重要符号，正如小说所说：“翻开电话簿，都是一些古老而又遥远的名字，如哈克贝利、丁梅斯代尔以及数不清的戈尔德，美国人可以决定自己成为谁”（20）。²戈尔登为全家新取了颇具罗马身份和气质的名字：尼罗·朱利亚斯·戈尔登（Nero Julius Golden）、佩特洛尼乌斯（Petronius）、卢修斯·阿普列尤斯（Lucius Apuleis）和迪俄尼索斯（Dionysus）。在机场到新家的路上，戈尔登对他的儿子们说：“名字代表一个人的德行和财富，如果有人问起我们是哪里人，就说我们刚从卡内基山搬过来，或者说我们乘着藏在彗星尾巴里的一艘宇宙飞船，从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系飞到这里。欺骗、编造也罢，要让别人相信我们是美国人”（11）。戈尔登的邻居兼小说的叙事者热内（René）对此评价道：“身份问题在美国已成为一种新的强大势力，其地位不亚于任何神学或思想意识”（79）。戈尔登的自我命名一方面折射出在美国“白人至上”观念仍存余威的伦理环境之下，拥有身份话语就能进入政治和社会舞台的主导位置。另一方面，他的罗马名字如同他居住的那幢19世纪中期建筑风格的别墅，充满了美丽的假象，映射了失根者“真实与虚幻交叠呈现的心理现实”（19）。

戈尔登的长子佩特洛尼乌斯（简称“佩蒂亚”）患有重度自闭症，他常坐在花园的凳子上，握着一杯马提尼酒，“对着空气大声讲话，喘息声如幽灵般在风中飘荡”（49），或坐在窗帘紧闭的室内，“沉浸在网络游戏世界里，只有几盏台灯和电脑屏幕发出一些昏暗的蓝光”（56）。电子媒介成为他表达自我话语权的主要渠道，电子游戏中的骑士、格斗士和西部牛仔等数字身份给他带来了“电子共同体”中所特有的群体认同感和心理满足。佩蒂亚的自闭症一定程度上源于他父亲严苛的家庭教育。身处父权专制的伦理困境里，他从小就性格胆怯，不善交际。在成长过程中，“心理自我”逐渐与“社会自我”之间产生了认知失调，佩蒂亚内心也萌生了“从自我憎恨到对全世界的仇恨”（56）。这种“格格不入”的封闭感随着移居到新环境而加剧，终于在一个

1 2008年11月，印度孟买市中心的火车站、酒店和市政府等多处遭到武装恐怖分子袭击，其中泰姬陵酒店成为了首要袭击目标，拉什迪在此影射了这起恐怖事件。

2 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 Salman Rushdie, *The Golden House* (Toronto: Alfred A. Knopf, 2017)。译文均由笔者自译，以下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午夜，佩蒂亚身上的兽性因子在非理性意志的诱使下膨胀、爆发，变成了邻居眼中挥舞着胳膊，歇斯底里吼叫的疯子。福柯曾说：“背负各种罪名的疯子是无辜的，有罪的只是社会及其权利话语”（转引自张之沧 28）。佩蒂亚的怪诞行为是对印度父权制和教条主义下的伦理身份，以及对美国流行文化建构的物化身份的认知与反抗，是对孤苦无依、混沌的伦理身份的宣泄。他通过夸张的语言和“肢体默剧”，¹张扬了对完整自我的渴求。

次子卢修斯·阿普列尤斯（简称“阿普”）是一个英俊有才华的画家，移民给他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就是创作灵感的贫瘠和身份的迷失。他常游荡于纽约闹市和酒吧，渴望着再次回到他的出生地，“带着某种冲动去回顾过去，寻找失去的时光”（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s* 10）。在阿普的画室内，挂着一幅曼哈顿城市的写实油画，然而画上“没有川流不息的汽车和路人，只有一些漂浮着的半透明人，男人们都身着白色衣服，女人们都身着深红色衣服，他们或刚离开地面，或悬浮在半空”（230）。城市建筑的色彩十分阴郁，呈扭曲状，“犹如从一个坑洼的老旧玻璃窗格里折射出的镜像”。阿普这样描述他的感觉：“当你一只眼睛失明后，你就会感受到这样的世界。幽灵一样的人，不是我嗑药后的幻觉。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在卧室还是大街上，我都能感受到人们化为电子游戏中的人物，个个都残缺不全，分辨率极低”（232）。阿普对现代西方都市人群“诡景”般的勾勒有一种表现主义的特质，在看似荒诞的临摹中揭示了流散者在都市语境中丧失自我和信仰失落的异化形象，扭曲的都城则是大都市无生命性的现实写照。阿普的脑海充满了一些过去和现在混乱交织的回忆片段，一会儿是印度的泰姬陵、马拉巴山、孟买大酒店的恐怖袭击，一会儿是纽约的地铁、发电站、废弃的工厂、监狱和赌徒等，失去的过往和繁华多维城市空间下的异乡客体验如梦魇般在阿普的内心萦绕。正如艾略特笔下的“空心人”一样，拉什迪用图像叙事暗示了西方大都市中失根者“有态而无形，有影而无色”的伦理身份困境和家园感的缺席。不仅现代社会是一个牢笼，而且它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要受到其铁栏杆的塑造：“我们都是一些没有灵魂、没有心肝、没有性别和个人身份的存在物”（伯曼 32）。在这种“家的影子不断徘徊和暗中作用”的非家幻觉下（童明 106），阿普决定踏上寻根之旅，重返孟买，他毅然决然地说：“我要回去，这既是一段旅程，也是对我思乡之情的一种慰藉。那里有我想要的东西，否则一股来自过去的黑暗力量会穿越而来，令我窒息”（233）。

小儿子迪俄尼索斯（简称“D”）是个私生子，从小就对自己的生理性别和身世感到困惑。他着装怪异，常被人嘲笑为“娘娘腔”（man-womanish）

1 肢体默剧（corporeal mime）指演员透过肢体动作取代语言的表达，动作及运动常源自身体最深处部分。拉什迪在此以隐晦的方式对人物伦理身份与精神的困境作出了注解。

和“野孩子毛克利”(Mowgli)(70)。¹由于血统缘故和对性别服饰伦理的违背,他年幼时饱受家人和外人排挤。移居美国为他的变形之路带来了希望,他开始讨好他的哥哥,渴望得到伦理关怀,“在他的心中有股情感的潮水,他想把它分享给别人,同时也期盼着能有同样的回报”(71)。获得他人的爱能让个体受到关注,具有相应的身份和相应的生存权利(德波顿6)。被他人注意,得到他人的同情、赞美和支持,这就是D想从他的行动中获得的价值。同时,D自诩为赫尔玛弗洛狄托斯神(Hermaphroditus)的化身,是仙女与主神之子的合体,从伦理身份上为自己塑造出了一种尼采式的优越感。

D的女朋友瑞娅(Riya)在“身份博物馆”工作,对性别身份有着深刻的见解,她认为“承认差异才能实现共同的族群认同,人类历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革新,英语中涌入了大量的新词汇来描写这种变化:如‘性别的流动性’、‘双性人’、‘变性者’、‘性别不适’等。身份并非是固定的,是可商榷的”(121)。在瑞娅的鼓励下,D逐渐找到了一种认同感,“爱开始在他的心头扎根,把他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人”(103)。于是D开始大胆地“戴上雷朋眼镜和白兰度式的毡帽,画上和瑞娅一样的烟熏妆”(104),以至于路人误认为他们是一对姊妹。然而,正如聂珍钊教授所说:“伦理身份变化往往会直接导致伦理混乱”(《文学伦理学批评》21)。D的伦理身份变化与整体的社会价值产生了激烈冲突。尽管他做了变性手术,准备挑战传统的性别身份,但还是不敢面对家人,无法调适生理和伦理身份之间的差异,“他的非身体自我,即意识认同了他的变化,然而他的身体自我,却本能地否定了他的改变,后果就是身心上的双重痛苦”(116)。霍米·巴巴将这一症状称为“压抑的复现”,也就是非家幻觉,是多数“异域”、“异质”者在跨越地域、跨越文化初期都会经历的一种状态(童明106)。D因无法应对“突然的阉割、性别的反差和他者的凝视与审判”(251),无法在自我与伦理规范之间找到平衡,最终选择了自杀这种极端方式来逃离他的伦理困境。D的悲剧表明,伦理身份的获得是一个不断调整和协商的过程。只有居住在跨越性别阈限的第三空间,解开身份转变后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伦理结,D的生命和家园想象才有可能延续。

拉什迪以热内的“窥视”叙事视角,追溯了戈尔登一家移民到美国后的身份错乱,探讨了处于边缘地位的族裔流散者伦理身份的流动性,并尝试挖掘导致伦理身份困境的社会归因。这些角色既相互独立,又彼此相连,他们都在不断地商榷着自己的个体身份、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挑战了传统的身份观。移民改变了戈尔登一家,把他们变成了分裂和异化的自我。但他们若能像灰姑娘的姐姐一样来削足适履,纽约应该是一个童话镇(63)。然而,他们始终游移于印度这一“家”的影子和美国的现实之间,处于既无法遗忘

1 美国迪斯尼电影《奇幻森林》(The Jungle Book)中的主角,一个在父亲遇害后被狼群抚养长大的小男孩。

过去又难以完全融入现在的悬置状态。正如一位长居在美国的缅甸外交官在结尾时所说的那样：“总有那么一天我们会走到人生旅程的尽头，停下来望着奔流不息的河水，感慨到回家只是一种奢想”（266）。拉什迪采用纪实报道般的叙事结构和文学虚构相结合的写作手法，无论是从城市空间还是从历史文化方面都真实地呈现了流散者跨越边界后的伦理身份图景。

二、伦理身份的语言表征与秩序重构

在《金屋》中，拉什迪通过对帝国中心的“逆写”和解域，揭示了新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政治伦理身份所导致的社会和文化生态失衡。他用英语创作为武器，展开了从语言、文化到社会层面的伦理身份表征与秩序重构。

语言是文化身份形成的基础和重要表现形式，在言语交际中语言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文化的归属（陈建平 127）。拉什迪小说的书写语言（英语）虽取自帝国的中心，但是经过了一定改造，杂糅了大量的印地语和标准英语变体，构成了消弱和解构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符号和伦理身份的隐喻。在小说中拉什迪采用印地语的拉丁字母转写形式加英语注解的文化翻译策略，实现了本土语言与标准英语的地位并置，比如，“*mathadi workers, that is, laborers who carried loads on their heads.*”中 *mathadi* 指“将货物放在头上的搬运工”（334）；“*gharaney, households, or, nowadays, companies, a term presently popular in the mother country*”中 *gharaney* 指的是“家庭或社群，母国当下非常流行的一个词”（346）。在作为界限或边界的原文被跨越或解域后，原文发生了质变，变成了一个被解域的文本，一组新的关系中的一个新的组合（陈永国 41）。这些地方词汇与标准英语共生现象体现了印裔散居群体印度语和英语交替使用的双重意识，同时它们被赋予的文化权利诉求也在翻译的行为中得到了强化。拉什迪的“方言音译”和“语符转换”等语言挪用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弃用标准英语，将地方英语上升为重要文化话语的双重功效。事实上，地方英语的书写不仅引入了丰富多样的新词汇，用“他性”颠覆了强权语言的正统性，更对所谓的“英美及主要英语文学”以及作为英语经典文本基础的整个文化构想体系进行了秩序重构。

此外，在语言的词汇形态、句法规则和语篇层面，拉什迪采用了词汇变体、句法融合和打破英语常规语篇模式的语言批判，表明了伦理身份在社会层面的建构具有多重性和流动性的思想。当 D 完成生理性别转换后，拉什迪用“方括号 + 第三人称指示代词 ‘He’ 及其变格”的新词汇形式来界定这种伦理身份的模糊性，在对常规语言运用方式的“改造”中产生了新的意义，如“*After [his] adventure in Vasilisa’s clothes closet [he] had admitted to [himself] [his] pleasure in women’s clothing*”（在偷翻瓦莉萨的衣柜后，【他】承认穿女装能给【他自己】带来一种莫名的愉悦）（252）。拉什迪在文中解释道：“对

于 D 的新身份，我仍使用了阳性代词，这有些不妥。为了界定这种模糊性，我把‘他’放进了方括号里”（251）。语言变异的物理特性为小说带来了视觉表征上的冲击效应，体现了创伤等刺激的语义信息充斥着 D 的整个感觉记忆。有意识 / 无意识、我们 / 他者以及真实 / 虚幻的二元对立边界被打破后，D 为自我构造了一个作为“第三性”的社会伦理身份认同，即“我发现了属于我的生活，这种生活基于我的天性和我在世界中的位置”（阿皮亚 30）。拉什迪试图通过语言变型策略来解构被帝国强权视为权利结构的英语语法，对帝国语言的优势中心性进行了弃用。语言与伦理身份是相互依存的，在纯粹的文字层面，方括号中的“他”唤起的想象是移民和文化流散者等“边缘人”在文化夹缝中的屈辱姿态。语言本身成了转喻，以局部表示整体（阿希克洛夫特 48）。文本中嵌入的特殊标点符号阐释了“文化真相”，表明了语言的示意和建构功能，对正统英语的话语权利和秩序“标准”进行了重构。

众所周知，文化符号是构成身份的重要因素，在小说中拉什迪植根于印度民间文化这个基石，保留了大量未被翻译的印度文化负载词，对民族记忆进行了重述，体现了拉什迪建构族裔群体伦理身份内在共同性的话语策略。比如，小说中的印度古典乐器“tar-shehnai”（塔尔—薛奈琴）¹和谱写印度共同悲伤记忆的音乐“bombay-meri-jaan lyric”（孟买悲歌），小吃“mohinga”（鱼汤粉）以及宗教中的巫师“shaman”（萨满）等，作为凝结着民族伦理和文化记忆的象征物，这些文化负载词成为了联结印裔流散群体的原生纽带，家园皈依和文化 / 身份记忆生产的催化剂。地方民族文化的使用，是一种将其自身作为政治话语嵌入后殖民写作中的话语策略（阿希克洛夫特 52）。“缺位”也是一种建构，翻译的缺位在这里则具有特殊的解释功能，能够引导读者积极介入到使用这些词汇获得意义的文化领域。后殖民文本选择保留未经翻译的词语，构成后殖民话语的特殊符号，不仅构建了文化之间的差异，更是一种给予地方语言和文化以更高地位的政治行为。拉什迪的印度伦理身份就是在对印度文化俗语的挪用之中建立起来的，这种跨文化文本不断地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印度文化的特性与差异，质疑了文化上出现的民族身份的一元神话，重构了文化领域的秩序。

因备受压迫、流散、移民、流放等经历，拉什迪作为后殖民主义的主体虽居无定所，但占据着发声的场所（对比那些沉默不语的人）（圣胡安 5）。他通过解码本土语言文化符号和改造标准英语的编码方式，完成了对民族记忆的重述和伦理身份的重构。拉什迪对英语进行小民族使用，重新分布声音和词语、词语和意义，是为了“瓦解隐含语言中的权利关系，解域克分子身份（molar identity），颠覆既定的身份秩序，为创作新的身份创造条件”（尹晶 136）。因此，他的语言挪用策略不仅实现了抗衡帝国文化权威的政治目的，更有呼吁后殖民作家重构本民族历史、文化等伦理身份和伦理秩序的感召力。

1 印度一种传统弓弦乐器，和埃史拉吉琴（Esraj）相似，声音如喷呐和小提琴般哀怨凄美。

三、伦理共同体建构及其道德意蕴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推进，人类世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远超过往，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诸如“人的全面发展、多元文化和世界体系重构”等全人类性的问题。作为一个“文化杂交”主义者，拉什迪将“伦理共同体”作为构建一种新的多重伦理身份、实现人类理想社会追求的重要域所。在他看来，这一自足的伦理空间能以隐喻的方式与外部世界形成根本性对抗，传达作家对生命、对个人存在和社会的关切和热爱（何卫华 70）。

“共同体追寻”，即寻找认同与故乡，是人类的境况本然的一部分（安德森 17）。在小说《金屋》中，拉什迪超越了民族渊源和地域空间，呼吁拥抱文化杂交，挑战文化霸权；在伦理选择道路中，寻求多元主体性的伦理共同体形式。殷企平教授指出：“文学家在倡导 / 想象共同体时并不仅仅是把它看作一种形而上的概念，更多的认为它是一种文化实践”（殷企平 76）。拉什迪的伦理共同体建构过程，就是一种找寻伦理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的文化实践。在《金屋》中，他通过重现东方传统文化和一些少数族裔的文化仪式，对“文化杂糅”的伦理共同体形式进行了“自我审视”和“自我叙述”。首先，中国的《易经》文化等为族裔流散群体提供了克服现代性伦理身份危机的文化空间。小儿子 D 随时都装着 3 个银币，对照《易经》中的卦图来为自己占卜。在一次音乐会上，D 的着装和相貌举止等受了别人的异样目光，于是他用银币卜出了“卦画二十三”——“下面五个阴爻，上面一个阳爻。卦解是‘剥’，山地剥，上艮下坤。大致是‘有所往则不利’的意思”（76）。随后 D 便离开了这个充满敌意的环境，回到了家中。当身体与文化都离乡背井，归属感就成为了他们随身携带的方舟（伊罗生 87）。处于他人的凝视中，D 的内心充满了不安，《易经》富有哲学和人文精神的诠释成为 D 确认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参照，成为帮他非家的身份焦虑中逃离的方舟。此外，在中国戏剧的“反串”艺术中，D 也找到了共通的伦理身份认知。当在身份博物馆工作的瑞娅把他带到“中国戏曲的性别易服”展区时，他说道：“我的确要好好了解一下”（76）。中国特色的人文景观不仅为他提供了调适孤苦心理的社会物理空间，更能让和他一样的“边缘人”在流离失所的境遇中找到文化归属。其次，源自巴西的“萨满教的神圣弥撒仪式”¹（ayahuasaca）（230）等充满异域特质的少数族裔文化，不仅对塑造民族情感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为阿普的伦理身份认同提供了重要的“他者镜像”。当阿普因无法定位自我伦理身份而产生身份焦虑的时候，这种神秘仪式就成为他直面恐惧和忘却创伤的文化实践。共同体承认每一个独特的民族身份认同，包括自我的认同与“他者”的认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摆脱傲慢偏执的民族中心主义，寻求

1 在亚马逊流域，原住民将迷幻草视为一种灵性药物，并将其广泛应用于宗教仪式中，主要作用为治疗心灵创伤，让人面对恐惧及净化身体。

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之间的和平共存之道（安德森 17）。对拉什迪来说，伦理共同体就是这样一种认同伦理身份多样性的文化实践，是遭遇后殖民 / 全球化时代冲击的族裔流散群体走出生存困境的化解之道，是强调人与人之间情感与相互关怀的精神追求。

“权利、价值平等”和“公德作为社会转型的道德形态”是伦理共同体的内核（Charvet 167）。拉什迪的“伦理共同体”想象旨在唤起个体文化身份、族裔身份等伦理身份的觉醒，以重构理性社会的道德理想，传递“人类共享道德经验的渴望”（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14）。在《金屋》中，拉什迪用混乱的政治、媒介、家庭、婚姻等伦理关系揭露了美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动荡性，解域了“后真相”时代美国的社会伦理秩序。正如披着美女画皮的俄罗斯女孩瓦莉萨，美国等西方社会已被消费主义、流行文化等意识形态所侵蚀，奉行金钱至上、实用主义的伦理道德“在骨子里依旧是食人的巴巴·雅加”（83）。¹对于美国理性丧失、伦理缺位的社会现实，拉什迪道出了回归传统道德规范的伦理共同体心愿：“希望有一天电视上不再有假新闻，人们远离网络，朋友不再是虚拟的，一家人能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一起享受美妙的音乐，爱才是至高无上的”（359）。伦理共同体必然是一个爱的共同体（曾云 19），拉什迪对西方现代社会道德的批判和建构诠释了只有遵循德行与爱的伦理法则才能实现伦理共同体的构想。

优秀的文学家都有一种“共同体”的创作冲动，憧憬一种超越亲缘和地域的、具有活力和凝聚力的共同体形式（殷企平 78）。通过对多民族文化身份的刻画及对美国政治伦理身份的解构，拉什迪从文学 / 文化文本的话语层面对伦理共同体的文化之根及道德之柱进行了塑造。正如聂珍钊教授所说：“伦理批评并没有同传统道德批评决裂，而只是一次对现实中文学批评抛弃道德倾向的反拨，是新时代文学批评回归传统的努力”（《从伦理批评到文学伦理学批评》174）。拉什迪通过关注伦理身份的困境，指出建立新的伦理秩序和公平与理性的道德规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他看来，“施暴者必须受到应有惩罚，这才是社会秩序重构的普遍伦理，否则我们将生活在一个荒谬的世界”（159）。作为当代移民文学中伦理身份问题的发言人，拉什迪对于流散者在后传统秩序中“应该如何生活”这一问题在文中也给出了他的答案：“学会深思，正视不幸，追求自由，身份的模糊状态终会消解”（291）。他刻画的伦理身份、重构理性社会秩序的伦理意识及伦理共同体想象不仅是对生命意义的本真追求，更是一种历史和文化上的“寻根”，对人类历史上文明的冲突以及文化的共生和融合等问题的伦理之思。

Works Cited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

1 在俄罗斯民间童话中，巴巴雅加（Baba-Yaga）是专吃小孩的女巫，会使魔法，形象狰狞可怖。

民出版社, 2016年。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Trans. Wu Ruire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6.]

夸梅·安东尼·阿皮亚:《认同伦理学》,张容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

[Appiah, K. Anthony. *The Ethics of Identity*. Trans. Zhang Rongnan. Nanjing: Yilin Press, 2013.]

比尔·阿希克洛夫特等:《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任一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Ashcroft, Bill, et al.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Trans. Ren Yiming. Beijing: Peking UP, 2014.]

Batra, Jagdish. "Salman Rushdie's *The Golden House*: Classical Worldview for Postmodern Tim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view* 2 (2018): 501-510.

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 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Berman, Marshall.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Trans. Xu Dajian and Zhang J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4.]

Charvet, John. *The Idea of an Ethical Community*. Ithaca, NY: Cornell UP, 1995.

陈建平等:《社会、文化、身份与话语建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Chen Jianping, et al. *Society, Culture, Identity an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7.]

陈永国:“界限与越界:小民族文学的解域化”,《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2005):41-48。

[Chen Yongguo. "Limit and Transgression: The Deterritorialization of Minor Literature."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6 (2005): 41-48.

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陈广兴 南治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

[De Botton, Alain. *Status Anxiety*. Trans. Chen Guangxing and Nan Zhiguo.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8.]

何卫华:“《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身体和伦理共同体”,《外国文学研究》3(2014):68-74。

[He Weihua. "Body and Ethical Community in *Lady Chatterley's Lover*."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 (2014): 68-74.]

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邓伯宸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Isaacs, Harold R. *Idols of the Tribe: Group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Trans. Deng Bochen. Guilin: Guangxi Normal UP, 2015.]

McLaughlin, Robert L. "Post-Postmodern Discontent: Contemporary Fiction and the Social World." *Symplokē* 1 (2004): 53-68.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0): 12-22.]
- : “从伦理批评到文学伦理学批评: 《美国伦理批评研究》序言”, 《文学跨学科研究》 2 (2017): 171-177。
- [—: "From Ethical Criticism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Preface to *American Ethical Criticism: A Survey*."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2 (2017): 171-177.]
- Rushdie, Salman. *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1991*. London: Granta, 1991.
- 小埃·圣胡安: 《超越后殖民理论》, 孙亮 洪燕妮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
- [San Juan, E., Jr. *Beyond Postcolonial Theory*. Trans. Sun Liang and Hong Yanni. Beijing: China Renmin UP, 2016.]
- 童明: “暗恐 / 非家幻觉”, 《外国文学》4 (2011): 106-116。
- [Tong Ming. "The Uncanny." *Foreign Literature* 4 (2011): 106-116.]
- 尹晶: “解域、逃逸与创造: 印度当代英语小说的小民族文学性”, 《外国文学研究》4 (2017): 134-143。
- [Yin Jing. "Deterritorialization, Flight and Creation: Contemporary Indian Novels in English as Minor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 (2017): 134-143.]
- 殷企平: “西方文论关键词: 共同体”, 《外国文学》2 (2016): 70-79。
- [Yin Qiping. "Community: A Keyword in Critical Theory." *Foreign Literature* 2 (2016): 70-79.]
- 曾云: “爱与伦理共同体——胡塞尔的社会伦理现象学”,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 (2016): 16-22。
- [Zeng Yun. "Love and Ethical Community: Studies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and Social Ethics".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 (2016): 16-22.]
- 张之沧: “走出疯癫话语——论福柯的‘疯癫与文明’”, 《湖南社会科学》6 (2004): 28-32。
- [Zhang Zhicang. "Out of Lunacy Discourse: On Foucault's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Hunan Social Sciences* 6 (2004): 28-32.